

世界汉语教育史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张西平

提要 本文对世界汉语教育史的研究对象和方法展开初步讨论, 作者认为世界汉语教育史的研究对象是: 汉语作为外语研究的历史, 或者说汉语作为外语学习的历史。由于世界汉语教育史的研究对象具有跨学科的性质, 从而对其研究的方法也具有多样性, 可以运用多种学科的研究方法对其展开研究。对世界汉语教育史的研究提示我们应重视学科史的建设, 这一研究必将从历史的角度进一步推进汉语国际教育的理论体系的建立。

关键词 世界汉语教育史 研究对象 研究方法

○ 引言

王力先生在《汉语史稿》中说: “汉语史是关于汉语发展的内部规律的科学。”(王力, 1980: 1) 他认为, 为了研究汉语史应该注意对汉语的亲属语言的研究, 例如, 对汉台语群中的各类语言的研究, 对汉藏语系中的藏缅语群的研究。为研究汉语古代语音, 还应对日语、朝鲜语、越南语中的汉语借词展开研究。但从根本上讲, 汉语史首先是和中国史、汉族人的历史密不可分的, 因而, 汉语史的研究基本上是以中国史为背景、以汉族人的语言认知活动为内容展开的。到目前为止, 所有已出版的汉语史研究著作基本上都是以此为基点展开的。这样做无疑是正确的, 但汉语的历史还有另一个重要的方面, 即汉语作为外语研究的历史, 或者说汉语作为外语学习的历史。这样的历史不仅在中国发生, 也在世界各地发生。对于汉语这样的历史也应给予研究和重视, 本文对如何研究汉语作为外语教学和学习、研究的历史做一简要的探讨, 以求教于各位方家。^①

^① 世界汉语教育史研究兴起的标志是董明《古代汉语汉字对外传播史》(2002)和张西平《西方人早期汉语学习调查》(2003)的相继出版。2005年首届“世界汉语教育史国际研讨会”在澳门召开, 会议期间在澳门注册成立了“世界汉语教育史国际研究会”, 并在澳门出版了首届会议的论文集《世界汉语教育史研究》, 这标志着这个学科的正式确立。2007年在日本大阪的关西大学召开了“世界汉语教育史国际研究会第二回会议”, 会议主题为“16—19世纪的西方汉语学习”, 并将在澳门注册的“世界汉语教育史国际研究会”转移到日本大阪正式注册, 选举产生了新的学会领导, 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张西平教授当选为会长, 学会决定2010年在罗马召开世界汉语教育史第三届国际研讨会, 这些标志着这一领域研究的深入和成熟。

一 世界汉语教学史的研究对象

世界汉语教育史就是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育在世界范围内所发生的历史过程。这一定义已经大略地确定了世界汉语教育史的研究对象的基本内容。

把汉语作为目的语进行学习和教育有着悠久的历史,鲁健骥先生最早明确提出这个问题,他说:“有史有论,是一个学科存在的必不可少的条件。近二十年来,对外汉语教学的科学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可以说在‘论’的方面,有了一定的基础,在‘史’的方面,显得十分不足。到目前为止,还只有一些很零散的记述。因此,我们应该改变这种状况,尽快地开展起对外汉语教学历史的研究。”(鲁健骥,1999)毫无疑问,对外汉语教育史是世界汉语教育史的最主要内容,但并不是唯一的内容,世界汉语教育史的研究应该有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对外汉语教育史。汉语在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传播有着悠久的历史,汉语的对外教育始终是中国历代王朝的国家政策,作为语言教学,这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给我们研究对外汉语教学留下了极其丰富的经验。如董明(2002:639)所说:“闹清中外古人汉语教学的内容、特点及方式、方法,寻求其中有规律的东西,总结其经验教训,继承其优秀传统,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以便探索出一条真正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文化底蕴、符合汉语汉字特点的对外汉语教学之路,搞好今天的对外汉语教学,促进学科的发展、建设,使之日臻完善、成熟。”这点出了展开对外汉语教育史的重要理论意义。只有做好学科的历史研究,才能真正走出完全盲从于西方的二语习得理论,用其裁剪中文作为外语教育的特点,从而完全忽略了汉语汉字特点的研究路向。历史研究会给予我们新的智慧,汉语作为外语的教育有着比西方更为悠久的历史。我们必须承认对于中国古代的对外汉语教育史的研究才刚刚开始,这是一个亟待开拓的学术研究领域。学术界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施光亨的长文《历史上的汉语教学:向着第二语言教学走出的第一步》(2005)对对外汉语教学史做了一个系统论述,给我们展示了对外汉语教育史的丰富内容。

目前急需对中国古代到当代各个时期的对外汉语教育史展开断代史的研究,对中国历史上的对外汉语教育史的重要人物和文本展开深入的个案研究,只有将断代史研究和重要的个案研究做好了,我们才能真正写出一部较为完备的对外汉语教育史。近年来学术研究已经开始向这样的方向发展。例如,张宏生编辑的《戈鲲化集》(2000)就是一个很好的对外汉语教育史的文献整理个案。在澳门召开的首届世界汉语教育史国际研讨会上,鲁健骥先生的《〈践约传〉——19世纪中叶中国人编写的汉语简易读物》、鲁宝元先生的《人在海邦为俊杰,学从中华问渊源:乾隆23年琉球王国第四批派遣留学生北京学习生活调查》、刘丽川的《清末的韩、中〈外国教师合同〉比较研究》、张美兰的《掌握汉语的金钥匙:论明清时期国外汉语教材的特点》、施正宇的《汉语教师戈鲲化出使哈佛初探》等论文(详见李向玉等,2005)从不同的方面展示了对外汉语教育史的研究内容。程裕祯主编的《新中国对外汉语教育发展史》(2005)则对当代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史做了系统的梳理,从而开启了对外汉语教育研究史断代史研究的先河。

第二,少数民族汉语教育史。中华文化的历史就是一个汉民族同其他少数民族文化不断融合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不仅汉字的传播直接影响了中国境内少数民族文字的形成和

发展(陆锡兴, 2002: 99—274), 而且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今天, 都存在着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学习汉语、接受汉语教育的历史事实。戴庆厦、董艳(2006)认为, 中国少数民族的双语教育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分别经历了从秦汉到明清、从清末到民国和新中国时期的双语教育。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满族入关后的汉语学习, 他们留下了一系列的汉语学习的历史文献, 这对我们研究汉语教育史都是很珍贵的。从现实来看, 目前正在进行的少数民族的汉语教育给我们提供了现实的材料。虽然, 这不是对外汉语, 当仍是将汉语作为目的语的教育, 也同样是一种第二语言教学。(吕必松, 2001)^②因此, 对中国国内少数民族的双语教育的历史、学习汉语的历史的研究同样是世界汉语教育史研究的基本内容。

第三, 国外华文教育史。这是指对在国外生活的华人的汉语教育。“有水井之处就有华人, 有华人之处就有华教”。这说明华文教育历史的久远。华侨的汉语教育一般都是在双语背景下进行的, 汉语也是作为目的语来学习的, 因此也应作为汉语教育史的研究范围。郑良树先生三卷本《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简史》(2007)给华文教育史的研究提供了典型的范例。近期出版的黄昆章先生的《印度尼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2007)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国别华文教育史的范例。这方面的研究也亟待展开, 我们需要从不同国家的华人历史情况出发, 研究在不同地区和国家的华文教育的重要人物、著作和教材, 研究在不同语言背景下展开中文教育的方法和特点。

第四, 国别汉语教育史。由中国政府主动派出教师进行汉语教学的历史并不长, 但汉语作为目的语学习的历史却很长, 凡国外自主进行的汉语教育, 并不能归为对外汉语教育。对各国汉语教育的历史、人物、教材和研究著作做系统的研究是世界汉语教育史的重要和基本的研究内容。在这方面已经有了初步的研究成果, 六角恒广的《日本中国语教育史研究》(1992)和牛岛德次的《日本汉语语法研究史》就是这种研究的典范(见吕必松, 1993); 白乐桑的《法国汉语教学史浅论》(1993)、金基石的《韩国汉语教育史论纲》(2004)都是最早进行这一研究的论文。在世界汉语教育史首届国际研讨会上丁超的《罗马尼亚汉语教育的发展》、潘奇南的《二十世纪新越南成立后的汉语教育》、李明的《20世纪的瑞典汉语教育》、梁志桦的《新西兰的中文教育历史及其教学模式》、董淑慧的《保加利亚汉语教学史概论》等论文(详见李向玉等, 2005)都是近年来国别汉语教育史的最新研究成果。

文献的收集和整理是做好国别汉语教育史研究的基础性工作, 历史学的所有研究都是建立在材料和文献的基础上的, 这是它和理论研究的重要区别。近来这方面也有可喜的进展, 汪维辉教授整理的《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刊》(2005)开启了国内国别汉语教育史文献整理工作, 在国外做得较好的是日本, 日本学者六角恒广《中国语教本集成》(1998)系统整理了日本各个时期的汉语学习教材, 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这些学术进展说明, 如果推进国别汉语教育史的研究, 首要的问题就是要系统地收集和整理世界各国的汉语学习历史文献, 对这些基础性的文献加以整理和翻译是展开研究的第一步。除文献的收集与整理外, 对各国重要的汉语研究者的著作和各个时期的汉语教材做个案的深入研究也是一项重要的工作。

^② 木哈白提·哈斯木(2001)指出: “对少数民族来说, 汉语虽然不是外国语, 但它毕竟是一种非母语的外族语, 少数民族使用自己的母语的习愤, 同样也会对汉语的学习产生干扰甚至抗拒作用。”

在理论上,国别汉语教育史研究中有两点较为重要:一是注意在历史研究中展开对比语言学的研究,研究汉语与其他外国语言接触中的特点,注意吸收对比语言学的成果^③,这样我们就可以从各国的汉语教育的历史著作中总结汉语作为外语学习的基本经验和规律。二是注意各国汉语政策和语言政策历史的研究,发生在国外的汉语教学不仅可以从对比语言的角度展开,也应注意语言外的影响,即别国的语言政策和汉语政策对汉语教学的影响。语言政策是应用语言学的重要内容,但在以往的汉语教学研究中较为忽视,但一旦我们将汉语教育的历史研究扩展到国外,语言政策问题就成为一个事关各国汉语教育成败的大事。

第五,国外汉学史。各国的汉学家在他们进入中国各个具体学科研究之前,第一步就要学习汉语,因此,各国的汉学史为世界汉语教育史的研究提供了大量丰富的文献。关注海外汉学史的研究,从中提取有关汉语教学历史材料是展开世界汉语教育史研究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在历史上,不少汉学家本身就是汉语教学的实践者或领导者,他们留下了一些重要的汉语教学的著作和文献,如法国的雷慕莎(Abel Remusat 1788—1832)的《汉语启蒙》既是从事汉语教学的教材,又是西方汉学史的重要著作。实际上,如果做海外汉学史研究,忽略了这一部分,那也将是不完整的。(参见张西平,2003;姚小平,2004;许明龙,2004等)

这样,我们看到,世界汉语教育史研究对象是包括对外汉语教育史和国内少数民族双语教育史在内的世界各国汉语学习和展开汉语教育的历史。我们倡导世界汉语教育史的研究就在于,试图通过对各国汉语教育史的研究,探讨汉语在与世界各种语言接触中各国汉学家和语言学家对汉语的认识和研究,总结汉语作为目的语进行教育的特点、规律和方法,以为今天世界范围内的汉语教学研究提供学术和历史的支撑。

二 世界汉语教育史的研究方法

通过以上我们对世界汉语教育史的研究对象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世界汉语教育史的研究实际上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它的研究范围已经大大超越了单纯的应用语言学的研究范围。研究范围的扩大必然导致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因此,在展开世界汉语教育史的研究时,所采取的方法是多样的,笔者认为在多样的研究方法中以下四点较为重要:

第一,语言习得理论的研究方法。

对外汉语教育史的研究只是对外汉语教育研究的一种历史延伸,对外汉语教学作为一种外语教学,其方法的特点和独特性同样适用于对外汉语教育史的研究。对外汉语教育史是世界汉语教育史的重要部分,因而,在展开世界汉语教育史研究时,对外汉语的语言习得理论自然成为它的研究方法。关于语言习得理论的研究方法,刘珣(2001)讲得很清楚,他说:“语言学的任务是研究语言,把语言的规律弄清楚,它的任务就完成了。语言教育学科则不能到此为止,它不是为研究语言而研究语言。因此,除了对汉语这一客体的研究外,本学科还需要研究教学活动的主体即学习者,研究学习者汉语习得的过程和规律,以及学习者的生理、认知、感情等个体因素——这是第二语言习得的研究。”这就是说,在对外汉语教育史的研究中要特别注意总结历史上的汉语习得的历史过程和规律,学习者的各种因素对汉语学习的影响。

^③ 对比语言学研究成果可参见潘文国、谭慧敏(2006)。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目前在西方出版的第二语言习得的理论研究,基本上是在建立在西方语言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实践基础上的,这些西方语言学家大多对汉语没有研究,因此,这样一种第二语言教学研究的理论是有局限性的,这点西方的语言学家也是承认的。^④

这个事实告诉我们,在我们把第二语言习得的理论应用于汉语教育史研究时,要考虑到它的局限性。在这方面,对外汉语教育界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字本位的提出就是一个证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研究世界汉语教育史对于建立基于汉语本身的第二语言习得理论具有重要意义。正是几千年中国本土的对外汉语教学的历史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经验和教训,正是在研究世界各国汉语教学的历史中,我们可以总结出真正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普遍性规律,并从这种历史的研究中提升出更普遍的规律和理论,丰富一般的第二语言习得理论和外语教学理论。

这就是说,在世界汉语教育史的研究中,一方面要善于使用当下语言习得的理论和方法来指导我们的历史研究,另一方面,又不要局限于当下的那种以印欧语的语言习得为经验所总结出的一般的原理,而是创造性的从世界汉语教育史的历史经验中丰富、发展出真正从中国语言文字特点出发的语言习得理论。

第二,中国语言学史的研究方法。

任何语言的发展都是在与其它语言的相互接触中变化与发展的。王力先生早年明确作过论述,这已经被中国语言发展的历史所证明。佛教传入中国后,不仅对中国的宗教和思想产生了影响,对中国的语言也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参见王力,1980)基督教自明末传入中国以后,对中国社会和思想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同时对语言的影响也是很大的。近代以来,中国语言在语音、语法、词汇三个方面的变化都和基督教的传入有极大的关系。从语音来说,现在我们的汉语拼音系统的基础就是传教士所确立的。罗常培先生早年的论文至今仍有很高的学术价值。^⑤近年来杨福绵(1995)对利玛窦、罗明坚《葡华辞典》的研究,张卫东(1998)对《语言自述集》语音的研究都有突破性的进展。语法方面,姚小平(1999)最早对将《马氏文通》作为中国近代第一部语法书的观点提出批评,2003年在北京召开了“西洋汉语史研究国际讨论会”,并出版了万济国的《华语官话》一书^⑥。实际上万济国也并不是第一个写出中国语法的传教士。对法国入华传教士马若瑟《中国文法》的研究已经开始(李真,2003)。词汇方面,最有影响的是意大利汉学家马西尼所写的《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1997)一书,此书使我们对近代以来中国语言的形成历史有了一个新的看法。这方面日本关西大学的沈国威等有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参见沈国威,1994)这些都说明,在我们研究世界汉语教育史时,其实已经进入了中国语言学史的研究领域。

这样一个事实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无论是佛教的传入还是基督教的传入,这些

^④ 英国社会语言学家 R A Hudson在《社会语言学》的中文序中说:“一件令人尴尬的事实是,(书中)一次也没提到中国,这一方面反映出我本人的无知,但同时也反映了中国没出现在我所读过的著作和论文之中这一事实。”转引自《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第六次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 130页。

^⑤ 国内学者在这方面大多局限在对《西儒耳目资》的研究上,实际上传教士所留下的大量语音文献至今尚未被系统研究。

^⑥ 国外已经开始注意这一研究领域,参见 Bieitenbach(2004)。

外来者最初只是汉语的学习者，他们汉语学习的历史材料显然是世界汉语教育史研究的基本内容；另一方面，他们的汉语学习反过来影响了汉语本身的发展。研究这种语言接触对汉语的影响，就使我们进入中国语言学史的研究范围。对做中国语言学史的人来说，汉语教育史是其不可忽略的一个重要的方面，特别是传教士汉语的研究，将会对中国语言学史的书写产生重大的影响。同样，对于世界汉语教育史研究者来说，如果仅仅局限于第二语言教学的方法，仅仅将这一领域的研究放在对汉语教育史的研究中，已经不能更好地推进其研究。我们应该从更大的学术视野，从整个中国语言学史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运用中国语言学史的研究方法来进行研究，才能将其学术价值更好显现出来。

第三，汉学史的研究方法。

当中国语言从传统走向现代之时，在西方也正经历着一场“普遍语言学运动”（Mungel 1985），从大的历史背景来说，这是和地理大发现紧密相连的；从具体背景来说，西方各国的汉语学习是和当时西方各国汉学的兴起和发展密不可分的，或者说，西方各国的汉语教育本身就是西方汉学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欧洲文化界对中国语言的认识最早都是从入华传教士写的有关中国的书籍上看到的。据说中国方块字第一次出现在欧洲书籍中是在西班牙传教士门多萨的《中华帝国史》中，影响较大的是基歇尔（Kircher）的《中国图说》。他在这本书中首次公布了中国的一些象形的古文字，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兴趣。特别是他首次将《大秦景教碑》的碑文编成了拉汉对照词典，使汉字在欧洲第一次可以根据罗马拼音读出，可以根据拉丁文释义来理解，这在当时的欧洲是破天荒的大事。这恐怕也是在欧洲最早出版的欧洲人学习汉语时的第一部拉汉词典。（Kircher 1979）

第一次把中国语言放入世界语言研究范围内的著作是英国人韦伯（John Webb 1611—1672）的《论中华帝国的语言可能是原始语言的历史性论文》（1669）。这本书在西方影响很大。虽然韦伯本人从未来过中国，但他通过阅读传教士的著作提出了这种惊人的观点。从中国语言学的角度来看这本书价值不大，但从西欧思想文化史的演变而言倒有一定的地位，所以对西方人学习汉语、研究汉语具有重要意义。汉语教学史的研究不能仅仅从语言学的角度出发，还应从比较文化和比较语言学的角度考虑，关于这一点下面在讲方法论时还会提到。

德国早期的汉学家米勒（Andreas Müller）是欧洲本土最早研究汉语的人之一，他在自己著名的《Sinaica》一书中称他已找到了学习汉语的钥匙，可以很快地读懂汉语。这个消息曾一度使莱布尼茨十分动心，多次给他写信。（Mungel 1985）在俄国的德国早期汉学家巴耶（T. S. Bayer 1694—1738）也是最早学习汉语和研究汉语的人，他既研究中国文学也研究中文文法。（Lundbaek 1986）

1814年12月11日法国法兰西学院开设了汉学讲座，从此“传教士汉学”与“专业汉学”并存的时代开始了。“这个日子不仅对于法国汉学界，而且对于整个欧洲汉学界，都是有决定意义的”。（戴仁，1998）从此，汉语、汉语语法及《大学》等都成为法兰西学院的正式课程。第一任汉学教授雷慕沙（Abel Remusat 1788—1832）第一次讲中文文法时借助的是马若瑟的手稿，几年后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汉语教学著作《中华帝国通用的共同语言官话》奠定了他在汉语教学中的地位，而《汉文启蒙》（Éléments de la Grammaire Chinoise）很长一段时间

间内也成为法兰西学院的汉语教材。

德国汉学和汉语教学的奠基人是硕持(Wilhelm Schott 1802—1889)。他于 1833年在柏林开设中国语言文学课程,拉开了德国专业汉学的序幕。他于 1826年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是《中国语言的特点》(De Indole Linguae Sinicae)。(张国刚,1994 简涛,2000)他 1857年在柏林出版的《可用于讲课、自学的汉语课本》(Chinesische Sprachlehre zum Gebrauche bei Vorlesungen und zur Selbseunterweisung)很长时间内是德国人学习汉语的教材。

俄国汉学和汉语教学的奠基人是雅金夫·比丘林,他在北京呆了 14 年之久,其间他努力学习汉语,并最早开始编纂辞典。1831 年比丘林在哈克图开办了俄罗斯期的第一所汉语学校,并亲任教师,1838 年返回彼得堡后,又从事汉语教学和汉学研究 30 多年。“他的办学为俄国开办汉语学校提供了经验,所编《汉语语法》(1835)长期被沿用,直到 20 世纪初仍是喀山大学和彼得堡大学东方系的教材”。(李明滨,2000)

英国的汉学和汉语教学则落后于法国和德国,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入华以后,英国的汉学和汉语教学有了长足的进步。理雅格(James Legge 1815—1897)的英译中国典籍奠定了他在十九世纪西方汉学史上的地位。而翟理思(Herbert Allen Giles 1845—1935)在继承威妥玛汉字罗马拼音法的基础上所创立的“威—翟式”拼音也使他在汉语研究上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美国传统汉学的兴起是和基督教新教入华传教联系在一起的。按费正清(1997)的说法,它是“西方入侵的一部分”,美国大学的第一个汉学系是由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 1812—1884)1876 年从中国返回耶鲁大学后所创立的。“在卫三畏的主持下,建立了美国第一个汉语教学研究和东方学图书馆。翌年,哈佛大学也设置汉语课程,并设立东方图书馆。”(侯且岸,1995)

我在这里罗列这些历史事实是想说明:如果我们做国别的汉语教育史,那实际也就进入了汉学研究的领域,不从这个角度把握,我们很难摸清各国汉语教育史的线索。

第四,对比语言的研究方法。

研究汉语在世界各国的教学与研究就必然涉及到不同语言之间的比较,就必然涉及到不同语言之间的接触。任何一个外国人在他从事汉语教学和研究时很自然要受到其母语的影响,原有的母语对其学习汉语和研究汉语都有着内在的影响。因此,从语言对比的角度分析不同国家的汉语研究者的汉语观是我们研究世界汉语教育史时所必须掌握的方法。对比语言学最早是由美国人类语言学家沃尔夫(Benjamin Lee Whorf)提出来的,在西方语言学史上最早将西方语言和中文进行对比研究的是德国的语言学家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他所提出的汉语与印欧语系之间的比较的观点至今启发着所有从事汉外语言比较的学者。近年来中国学者在比较语言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他们所提出的比较语言学的原则和方法成为我们研究世界各国汉语教育史时所必须遵循的方法。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只有掌握了比较语言学的方法,才能更有效地进行世界各国汉语教育史的研究。

三 世界汉语教育史研究的意义

在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开设世界汉语教育史的课程是对外汉学专业一个重要的进步,任何学科都有理论与历史两个方面,学科史是学科理论展开的历史支撑,一个没有学科史学

科是不成熟的学科。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认识学习世界汉语教育史的重要意义。

第一,世界汉语教育史的研究将进一步丰富对外汉语理论的研究。

第二语言习得理论的提出不过几十年的时间,而世界各国的汉语教育和汉语研究的历史已经有二百多年,中国自身的对外汉语教学和双语教学的历史则更长。世界汉语教育史为对外汉语教学理论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和范例,通过认真研究世界汉语教育史的重要著作和人物,我们可以为汉语教学的理论找到历史的根据,进一步丰富当前的第二语言习得理论。例如,鲁健骥(2005)通过研究《语言自述集》中由中国文人所编写的教材《践约传》,认为《践约传》作为汉语学习的泛读材料有着启发意义,因为“泛读在我国的对外汉语教学中还不落实,由《践约传》开创的精泛互相配合的教学方法,没有继承下来”。他通过对《践约传》这个世界汉语教育史上的历史泛读教材的研究,进一步认识到加强泛读和精读的结合的必要性。所以,他呼吁“应该重视汉语作为外语教学的历史,包括我国的对外汉语教学史的研究,推动对外汉语教学学科的发展。当时从事汉语教学的外国人和我国的对外汉语教师思考的问题,也会对我们今天的教学有所启发,大有裨益的。”

第二,世界汉语教育史的研究将直接推进对汉语本体的研究。

文化间的交往必然带来语言间的交往,当汉语作为外语在世界各地被学习时,学习者会不自觉地受到母语的影响,从第二语言习得的角度来看,母语的作用会直接影响学习者的汉语学习。但很少注意到,学习者的这种习惯力量也同时推动着语言间的融和。

王力先生说:“中国语言学曾经受过两次外来的影响:第一次是印度的影响,第二次是西洋的影响。前者是局部的,只影响到音韵学方面;后者是全面的,影响到语言学的各个方面。”(王力,2006)这两次影响的启端都是从汉语作为外语学习开始的。佛教的传入,印度的僧侣们要学习汉语,要通过学习汉语来翻译佛经,结果,直接产生了反切。王力先生说,反切的产生是中国语言学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件大事,是汉族人民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的表现。西方语言学对中国的影响表现得更为突出,来华的传教士正是为了学习汉语编写了汉语语法书,如卫匡国(Martin Martini 1614—1661)为了读中国的书,写下了《汉语文法》;传教士们为了阅读中国典籍,发明了用罗马字母拼写汉字的方法;为了以中国人听懂的语言来布道以及翻译圣经等宗教书籍,创造了一系列的新词汇,包括至今我们仍在使用的词汇。这说明,当一种语言作为外语来被学习时,它并不是凝固的,它也会随着学习的需求而不断变化;反之,学习者虽然是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来学习的,但学习者并不是完全被动的,学习者也会对自己的目的语产生影响。语言间的融合与变迁就是这样发生的。直到今天,现代汉语形成的历史并未完全说清,而世界汉语教育史的研究则可以直接推动汉语本体的研究,可以直接推动近代汉语史的研究。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关于明清之际中国官话问题的讨论,长期以来一直认为明清之际的官话是北京话,但最近在传教士的很多汉语学习文献中发现,他们的注音系统是南京话,这些传教士在文献和他们的著作中也明确地说他们学习的官话是南京话。不仅西方传教士的汉语学习材料证明了这一点,同时在日本的汉语学习材料也证明了这一点。如日本江户时期冈岛冠山所编写的《唐话纂要》《唐译便览》《唐话便用》《唐音雅俗语类》《经学字海便览》等书,六角恒广研究了冈岛冠山的片假名发音后,明确地说:“这里所谓的官音是指官话的南京话。”(六角恒广,1992)这说明汉语学习的文献直接动摇了长期以来中国语言学史研究的结论。

至于语法和词汇两个方面,有更多的文献和材料说明只有在搞清世界汉语教育史的情况下,才能更清楚地研究好近代中国语言学史,甚至可以说,随着世界汉语教育史研究的深入,原有的前辈学者研究中国语言学史的结论将被重新改写。

第三,世界汉语教育史的研究将加深海外汉学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

以往在海外汉学史的研究中,绝大多数研究者是不把汉学家们的汉语学习历史和文献作为研究内容的,认为这样的著作和文献是很肤浅的,海外汉学史研究的是汉学家们专题性的研究著作。世界汉语教育史研究的展开使我们对以往海外汉学史研究重新反思,汉学家们的汉语学习文献和著作同样是海外汉学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例如,张西平对罗明坚(Michel Ruggieri 1543—1607)汉语学习史的研究,给我们提供了天主教早期最早的汉文本,揭示了罗明坚汉诗的学术意义和价值,这些都是在罗明坚的正式著作中所不可能发现的。

同样,正是在从事世界汉语教育史的研究中,我们才能掌握中华文化外传的轨迹,看到中国典籍向外传播和翻译的具体历史过程,这种研究将大大推动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

四 结论

世界汉语教育史是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这一领域的开拓必将极大地拓宽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研究范围,使学科有更深厚的历史根基,从而使我们在总结和提升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基本原理和规律时,不再盲目地追随西方第二语言教学的理论,而是从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悠久历史中总结、提升出真正属于汉语本身的规律。实际上,我们还可以在这一研究中为第二语言教学的理论和方法做出我们的贡献,将我们的历史经验提升为更为一般的理论,使其具有更大的普遍性。尽管这还是一个遥远的目标,但在学术上则是必须要确立的一种文化自觉的理念。先后两届世界汉语教育史大会的召开,是我们向这个目标迈出的第一步,“世界汉语教育史学会”的成立,则表明了中国学者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决心。

世界汉语教育史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涉及多学科,必须有多种方法的结合。我们在运用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方法时,一定要注意和中国语言学史的方法相结合。在一定意义上,中国语言学历史的研究和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和教育历史的研究是密不可分的。那种将汉语国际教育仅仅局限在课堂教学经验研究的方法是其学识不足的表现;反之,那种无视甚至轻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和教育历史的观点同样是一种学术上的短视。如果忽视了世界汉语教育史的研究,将无法揭示出中国近代以来语言变迁的真正原因。

同时,我们在这一研究中将会强烈地感到,中国语言学史的研究已经不再局限于中国本土,中国语言对国外语言发展的影响正是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的历史中产生的,这不仅表现在东亚一些国家的语言形成和发展之中,也表现在西方近代以来的语言变迁中。将世界汉语教育史的研究纳入学术视野,将使我们对中国语言的思考,对“汉语国际教育”的研究扩展到一个更为宽阔的学术空间。

参考文献

- 白乐桑 (1993) 法国汉语教学史浅论,《中国文化研究》第 2 期。
程裕祯 (2005) 《新中国对外汉语教育发展史》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戴庆厦 董 艳 (2006) 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的历史沿革, 见中国基础教育网, www.edu.cn/20011205/

3012866/shm1

- 戴仁主编(1998)《法国当代中国学》(耿升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董明(2002)《古代汉语汉字对外传播史》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 费正清(1997)新教传教士著作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见《费正清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 黄昆章(2007)《印度尼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简涛(2000)柏林汉学的历史和现状,《国际汉学》第4期。
- 金基石(2004)韩国汉语教育史论纲,《东疆学刊》第1期。
- 侯且岸(1995)《当代的美国“显学”》北京:人民出版社。
- 李明滨(2000)俄国汉学史提纲,见阎纯德主编《汉学研究》第四集,北京:中华书局。
- 李向玉 张西平 赵永新主编(2005)《世界汉语教育史研究》,澳门:澳门理工学院出版社。
- 李真(2003)马若瑟对中国语言学史的贡献,西洋汉语研究国际研讨会论文(北京)。
- 梁晓虹(1994)《佛教词语的构造与汉语词汇的发展》,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 刘珣(2001)谈加强对外汉语教学的教育学研究,见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语言文字应用》编辑部编《语言教育问题研究论文集》北京:华语教学出版社。
- 六角恒广(1992)《日本中国语教育史研究》(王顺洪译)北京:北京语言学院。
- 六角恒广编(1998)《中国语教本集成》日本:不二出版社。
- 鲁健骥(1999)对外汉语教学学科建设的一个重要课题——谈对外汉语教学历史的研究,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编《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第六次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华语教学出版社。
- 鲁健骥(2005)《践约传》——19世纪中叶中国人编写的汉语简易读物,见李向玉、张西平、赵永新主编《世界汉语教育史研究》澳门:澳门理工学院出版社。
- 陆锡兴(2002)《汉字传播史》北京:语文出版社。
- 吕必松(2001)《语言教育问题研究论文集》北京:华语教学出版社。
- 吕必松主编(1993)《国外汉语研究丛书》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 马西尼(1997)《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黄河清译)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 木哈白提·哈斯木(2001)少数民族汉语教学中引进对外汉语教学成果的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见《语言教育问题研究论文集》北京:华语教学出版社。
- 潘文国 谭慧敏(2006)《对比语言学:历史与哲学的思考》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沈国威(1994)《近代日中语汇交流史》日本:笠间书院。
- 施光亨(2005)历史上的汉语教学:向着第二语言教学走出的第一步,见李向玉、张西平、赵永新主编《世界汉语教育史研究》澳门:澳门理工学院出版社。
- 汪维辉编(2005)《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刊》北京:中华书局。
- 王力(1980)《汉语史稿》北京:中华书局。
- 王力(2006)《中国语言学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 许明龙(2004)《黄嘉略与早期法国汉学》北京:中华书局。
- 杨福绵(1995)罗明坚、利玛窦《葡华辞典》所记录的明代官话,《中国语言学报》第5期。
- 姚小平(1999)《汉文经纬》与《马氏文通》——《马氏文通》历史功绩重议,《当代语言学》第2期。
- 姚小平(2004)西方早期汉语研究再认识,17—19世纪西方汉语研究史简述,见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编《21世纪的中国语言学》(一),北京:商务印书馆。
- 张国刚(1994)《德国汉学研究》北京:中华书局。
- 张宏生(2000)《戈鲲化集》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 张卫东(1998)威妥玛氏《语言自述集》所记的北京音系,《北京大学学报》第4期。
- 张西平(2003)《西方人早期汉语学习调查》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郑良树(2007)《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简史》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编(1999)《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第六次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华语教学出版社。

Breitenbach Sandra(2004) *Leitfäden in der Missionärlinguistik* Frankfurt am Main

Kircher Athanasius(1979) *China Illustrata* Kathmandu Nepal

Lundbak Knud(1986) *T. S. Bayer(1694—1738) Pioneer Sinologist* Curzon Press

Mungello D. E.(1985) *Curious Land: Jesuit Accommod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Sinology* Stuttgart

Webb John(1669) *An Historical Essay Deavouing a Probability that the Language of the Empire of China is the Primitive Language* London Printed for Nath. Brook at the Angel in Gresham

作者简介

张西平,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汉学》主编。

(通讯地址:100089北京西三环北路2号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

第三届对外汉语学习词典学国际研讨会举行

为促进汉语的国际化传播及对外汉语学习词典的编纂与研究,第三届对外汉语词典学国际研讨会于2007年11月30日至12月2日在南京大学召开。这次会议由南京大学双语词典研究中心和高等教育出版社国际汉语出版中心主办,中北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和南京理工大学协办。中国辞书学会副会长、中国翻译协会副会长、本届研讨会组委会主席、南京大学双语词典研究中心博士生导师张柏然教授出席了会议,并致开幕词。南京大学校长助理周宪教授、外国语学院院长王守仁教授分别致词,祝贺本届研讨会顺利召开。

出席本届研讨会的有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和马来西亚的对外汉语教学领域和双语词典学领域的50多名专家学者,此外还有30多名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也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次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论文全面反映了近期对外汉语词典学领域最新的研究成果。入选论文均经过精心筛选,具有相当的理论深度和原创性,从总体上体现出对外汉语词典学在研究模式上的系统性、开放性、创新性,代表了当今对外汉语教学与双语词典学领域的发展状况和水平。

与会代表在会议上宣讲的论题范围广泛、阐发深入,其中包括对外汉语词典的类型、收词立目、释义、句法和语用信息的处理问题、例证的选择、插图匹配和语料库的使用等问题。

本次学术研讨会还于12月1日晚专门举办了青年学者论坛,来自全国各地的翻译学博士生和硕士研究生与对外汉语教学和双语词典界的专家前辈面对面,进行了相关论题的广泛交流和探讨,论坛气氛热烈,青年学者们感到受益匪浅。

大会于12月2日下午举行闭幕式,香港城市大学郑定欧博士致闭幕词。

(第三届对外汉语学习词典学国际研讨会组委会 供稿)

context and language activities. It discusses how the teacher designs and selects TIC for facilitating the students' language acquisition. The author asserts that the ideal TIC should 1) have concrete, authentic and relevant information; 2) create an information gap and communication motive; 3) carry appropriate cognitive burden and positive affective elements; and 4) lead to much more diversified and effective classroom interactions.

Key words: teacher initiated content, language activity, classroom interaction

The mechanism of Chinese localization and its application to teaching

..... WANG Guangquan and LIU Yingli, P115

In many cases, there is no specific referential form for a particular location, but there is localization mechanism in any language that helps to generate referential forms of locations. This paper, on the basis of classification of words that may be localized, defines and categorizes the localization markers, distinguishes self-referred localization constructions from other-referred localization constructions and summarizes the rules for Chinese localization. Finally, it discusses how to apply the rules to teaching.

Key words: localization, localization marker, localization constructions, nouns of locality, teaching Chinese localization

On the subject and methodology in the history of worldwide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 ZHANG Xiping, P122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subject and methodology in the history of worldwide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The author holds the opinion that the subject is about the history of studies or learning of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Since the research is multidisciplinary in nature, there should be various approaches in the research, i.e. all the approaches to study related disciplines can be involved. The research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n the world suggests that we must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history as a discipline which is bound to push forwar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n the world.

Key words: history of worldwide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subject methodology

An analysis of the first scheme for the scientific teaching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 19th century in Russia— a system developed by V. Vasiliev for recognizing and memorizing Chinese characters WU He, P133

V. Vasiliev was a great Sino-logist in 19th century, who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many aspects in the field of sinology in Russia after the great sinologist Y. Bichurin. This paper introduces and analyzes an important academic production of V. Vasiliev in Chinese linguistics: the system for recognizing and memorizing Chinese characters efficiently which made a breakthrough for learning Chinese characters by Russian students who had learnt them by rote and without any methodicalness. Obviously, it helped the students learn Chinese characters more efficiently. Therefore, V. Vasiliev's system is a very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the history of sinology as well as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in Russia.

Key words: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in Russia, formal system of Chinese characters, constituents of Chinese characters, V. Vasiliev